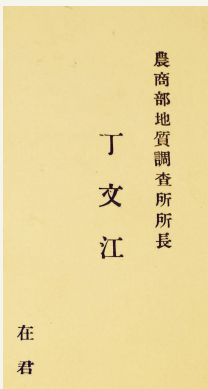


◀ 丁文江 1919年1月29日致奥斯朋信

► 丁文江送给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奥斯朋的名片



▲ 瑞典自然史博物馆赫勒教授(1921)

◀ (上接2版)

也成为了引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梁启超在巴黎时受到法国各界热情之接待,并参访战地。期间许多重要活动,包括演讲,多由丁文江翻译。通过欧洲数月的接触,丁文江对梁氏产生了很深影响。丁文江曾评价梁启超“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但他“分析能力极强,如果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必定能有不朽的著作”。梁启超晚年学术生涯向史学研究的转变中,丁文江的劝说起了很大作用。

丁文江抓紧机会与法国地理学界也建立了联系,在1919年4月5日由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汉学家高迪爱(Henri Cordier)主持的会议上,法国公共教育与艺术部历史和科学工作委员会委员下属地理部的秘书夏尔·德·拉·龙西埃(Charles de la Roncière)还宣读了丁文江3月29日在巴黎给他的一封法文信,信中介绍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从事的地图测绘工作。在巴黎期间,丁文江结识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主任查尔斯·肯尼思·利思(Charles Kenneth Leith)教授,之后便推荐学生到那里进修。还得便参观了洛林地区的铁矿业,并考察诺曼底、安茹(Anjou)地区的矿业和地质情况。

离开法国之后,丁文江在5月24日南下,到达西班牙的港口城市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几天后便到英国。6月6日,梁启超、徐新六、张君勱和杨维新一行重赴伦敦,与丁文江再次相会。梁启超在英国作了多次演讲,谈到中国的国民性等问题,演讲多由丁文江翻译。6月13日,丁文江、梁启超、张君勱、杨维新等四人一

起参观了苏格兰的海军造船厂(Rosyth Dockyard),并受邀在船上午餐。7月2日,在伦敦,英国工业联盟阿尔杰农·弗斯(Algernon Firth)爵士招待梁启超午餐,丁文江、张君勱、徐新六、杨维新和另外两位中国人作陪。

大约到了7月4日,丁文江与梁启超一行在伦敦告别,而梁启超一行继续到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地参访。7月8日,梁启超在曼城工程师俱乐部演讲,谈到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翻译改由徐新六担当。之前两日,丁文江在伦敦致信瑞典自然史博物馆的古植物学教授赫勒(Thore Gustaf Halle),拟于18日离开纽卡斯尔赴瑞典。赫勒曾于1916—1917年来华,收集中国古植物化石。1919年4月24日,当赫勒得知丁文江在巴黎,主动致信丁文江,欢迎他到瑞典访问。丁文江到达瑞典之后,拜访了赫勒和曾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任职的瑞典地质学家丁格兰(Felix Reinhold Tengengren),参观了瑞典北部世界最大的铁矿城基如纳(Kiruna)。在斯德哥尔摩,丁文江与留学生周赞衡亦有往来。周赞衡原是地质研究所的学生,1918年8月在瑞典的资助下,从上海经旧金山,来到瑞典自然史博物馆,随赫勒研究古植物学。丁文江和赫勒曾约定,让周赞衡研究赫勒和安特生收集的植物化石。但令人意外的是,装载赫勒在中国收集的大量化石标本的“Peking”号轮船在回国途中沉没,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对赫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原本让周赞衡依据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梦想也化为乌有。

在瑞典期间,丁文江为签证事颇费周折,曾委托周赞衡赴丹麦使馆办理签证,因不是本人亲自办理而遭拒。7月25

日,周赞衡又与丁格兰一起再次到丹麦使馆,使馆以同样理由拒绝丁文江的签证。7月28日,丁文江在拉各雷留乌斯(Axel Lagrelius)的帮助下,终于在丹麦使馆得到外交签证,当晚乘火车到哥本哈根。丁文江曾和拉各雷留乌斯会面,拉氏于当年9月15日成立了“中国委员会”,支持安特生在中国的化石采集工作。7月29日,丁文江与三位中国朋友拜访了颜惠庆,颜氏对丁文江颇有好感,评价他“见多识广”。在瑞京时,丁文江也可能拜会了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回国不久即在1919年12月2日致信斯文·赫定,感谢他赠送书籍。

7月30日下午,丁文江在哥本哈根乘坐“腓特烈八世”号轮船启程前往纽约,在美国漫游了近两个月,并再次访问华盛顿以及美国西部的矿物局。期间的活动我们虽了解不多,但最重要的是,丁文江通过美国地质调查所大卫·怀特(David White)博士的居间协调,促成了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担任首席古生物学家,并在北京大学教授古生物学,此后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古生物学家,迎来了中国古生物研究的黄金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1919年的北京也迎来了一位影响中国科学的重量级人物,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他来华后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为北京周口店古人类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开启了国际化合作的新时代。随着更多国际性学术刊物的创办,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逐渐走向国际,开启了中国科学的新纪元。

美国之行对丁文江影响很

大,它改变了他过去对美国的成见,他曾这样写道:“在许多欧洲人眼光里,美国根本没有文学,没有美术,没有文化。这一半是欧洲人看了美国人钱多,不知不觉的发生了嫉妒心;一半是所谓文学、美术与文化的标准都是欧洲式的,都是主观的。我以前也很受这种影响,看不起美国人与美国的出品。直等到1919年我到美国漫游了两个多月,才知道这种成见的可笑,才了解新大陆的新和大。同时,我又知道美国是‘天府之国’,不但地大,而且物博。其他的国家没有美国的矿产富源,而要过美国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丁文江的美国之行,也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关注,著名的《科学》(Science)杂志对丁文江的访美活动就有简短报道。

9月26日,丁文江从旧金山坐船回国,10月底返回北京,结束了长达十多个月的欧美之旅。他在回国后即在矿务司司长张轶欧的催促和翁文灏的襄助下,全心投入《地质汇报》等书刊的编辑。1919年底,《地质汇报》正式创刊,在创刊号上,当时的农商部总长田文烈、次长江天铎与矿务司司长张轶欧分别写序表示祝贺。丁文江也写了中英文序,在英文序的一开头,他特意引用了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中国》一书中的一段话,以此来刺激和鼓励年轻的后辈:

(指某一名具体的)中国人比较笨拙,在需要快速前进的时候,始终是个负担,而且这个国家特有的利益观念在他心中作祟:用自己的双脚走路是件不光彩的行为。而地质学家的工作,几乎可被视为放弃了全部的人类尊严。

这段用来激励年轻地质学

子奋发向上的话,被地质研究所的学生广为传颂,至今也常被学者提起。有意思的是,在这段德文下面,丁文江还特意加了罗马剧作家泰伦提乌斯(Terence)的一句话“啊!所有的事都是变的”(Omnium rerum, heus, vicissitudo est)。毫无疑问,丁文江是想说明,现在中国的情况变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已经诞生,李希霍芬所描述的情形,已一去不复返了!自强不息的精神,溢于言表。

同时丁文江向企业界募集专款新建图书馆,并以余款购置专门图书,为图书资料建设倾注了心血。他在欧洲期间,不仅委托赫勒广为购买地质调查所所需的古生物学书籍以及他自己所需的一些有关地质学、矿藏和矿物学的标准论著,后来还请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者多方帮忙。1921年9月,新图书馆终于在兵马司落成,成为中国最好的地质学、古生物学专业图书馆。

丁文江是20世纪中国科学界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早年学习动物学,兼习地质学,回国后又拓展到古生物学研究,致力于地质研究所的创建和人才的培养,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又创办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刊物,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中国地质学的本土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科学机构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1919年的欧美之旅让丁文江不仅增长了见识,开拓了眼界,也建立起广泛的国际交往网络。在繁忙的巴黎和会活动之余,丁文江还不忘考察法国、瑞典、英国和美国的铁矿和购买书籍,心系国家重任,全力服务于地质调查所。从现存的此次旅行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丁文江有着极强的领导、组织乃至外交才能。丁文江与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打交道,相互切磋,谋求合作,共同发展,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一切都以逐步推进中国地质学发展为目的。1919年正值地质调查所草创之初,筚路蓝缕,百废待兴,丁文江等人正是怀揣发展中国地质学的远大梦想与执着热情,孜孜不倦努力寻求国内和国际上的学术资源和资金帮助。

回顾丁文江的1919年,可以帮助我们重建民国初期地质学发展史,体会前辈学人的艰辛,并且可为当今学术交流提供借鉴,对新时代科学发展也大有教益。今年适逢丁文江出访欧美100年,特发此文,以资纪念,聊表对中国现代科学前辈的万分敬意。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